



WEILIAN · ZHANMUSI YU MEIGUO CHUANBO YANJIU

威廉·詹姆斯与 美国传播研究

王颖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C.B.J.J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WEILIAN • ZHANMUSI YU MEIGUO CHUANBO YANJIU

威廉·詹姆斯与 美国传播研究

王颖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廉·詹姆斯与美国传播研究 / 王颖吉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303-10949-4

I. ①威… II. ①王… III. ①传播学—研究—美国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1707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48 mm × 210 mm

印张: 8.5

字数: 212 千字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策划编辑: 陈佳宵

责任编辑: 齐琳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序

王颖吉的著作《威廉·詹姆斯与美国传播研究》获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用眼下最时髦的话来说，是填补了我国传播研究的空白。虽然说任何一篇论文的任何一点创新都是填补空白，但我知道这里的空白有点大，不狠下潜心研究的工夫是坚持不下来的。

至于写作过程的艰辛，只有颖吉自己体会最深，但是作为他的导师，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压力和其间付出的巨大努力，特别是他不满足于现有的中文资料，在原著和一大堆英文资料中爬罗剔抉，其间所下的“笨”工夫、“死”工夫让我十分感叹。现在的学生聪明机灵者居多，他们利用互联网灵活地嫁接各种新潮学说，拼贴概念方面的本领早已将他们的前辈远远甩在了后面，像王颖吉这样踽踽独行、一字一句地抠书本的年轻学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说他写得很艰难，主要是进入了一个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按照颖吉自己的说法，是想把詹姆斯在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贡献和今天的显学——传播学发展之间似隐似显的关系揭示出来。其实这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学术探险，在研究对象的把握上颇费周折。因为其间要转好几个弯，通过芝加哥学派，通过杜威、库利、米德、帕克、李普曼等绕到目的地。有时几个弯转下来就会迷失方向，探险之舟就会搁浅或者干脆翻船。幸好，谨慎的态度和扎实的功底将颖吉引渡到思想的彼岸。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的先驱，威廉·詹姆斯一个世纪以来曾得到弘扬、追随，也曾被遗忘和埋没。当我向王颖吉赞许地提到由上海

译文出版社出版，殷晓蓉翻译的罗杰斯《传播学史》时，他表示了自己的小小不满，因为罗杰斯在其很有影响的著述中没有论及詹姆斯的贡献，当然这些也反映在颖吉的这本著作中。

要了解詹姆斯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就不能不对他的机能主义心理学说和实用主义哲学有所理解。詹姆斯最初由生理学而进入心理学领域，也到德国听过实验心理学一千教授的课程，但是他对德国学者胶柱鼓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并不认同。他认为心理学研究更应该关注的是个体意识在适应环境时所发挥的功能，而不是在实验室环境下，通过内省体验或直接经验的分析来捕捉构成意识的那些静态元素。美国人就是美国人，尽管思想理论渊源来自欧洲，但他们站在大西洋彼岸，将欧洲的学术思想一一审视后为其所用，得天独厚的新大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换视角的大空间，使得他们能够开拓不同于欧洲前辈的新的研究空间。在詹姆斯看来，意识并非静止的、在实验室的规定情境中加以测试和描述的对象，而应是连绵不断的流动的河流。他的这一“意识流”理论后来竟意外地开启了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手法，加之他弟弟亨利·詹姆斯身体力行的倡导，这一创作手法遂蔚为大观，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登陆中国大陆，影响了一大批小说家和批评家。

还是回到詹姆斯的心理学。正如本书所论述的，他的学术思想对行为主义心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正是通过个体心理的研究，美国的传播学界陆续树起了效果研究的好几块里程碑。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尽管个体心理研究为社会心理学、群体心理学研究取代，但詹姆斯的整体和动态把握研究对象的立场已经被美国学术界广泛接受。

詹姆斯后半生致力于哲学领域，与心理学研究告别，也许正由于他从具体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得到启示，使认识升华到更高的层面，他更愿意在实践和动态过程中描述人类思想的进程。

关于实用主义，这里想多说几句。尽管詹姆斯曾经提出“有用

即真理”，强调了真理的效能和有用性，人们也往往偷懒而简便地将其作为基本定义来看待，但还有许多更有价值的看法为人们所忽视，如詹姆斯认为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外，个人从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看法不同，也构成了对真理的不同理解。这里，詹姆斯基本揭示了日常生活实践与人们认识之间的关联，也从经验主义层面首先质疑了本质主义的真理观。但是国人对“实用主义”这一概念在语用方面，往往等同于“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再等而下之，几近于“有奶便是娘”。其实，实用主义试图揭示的是物质和精神之间、认识和个人实践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反对以往形而上学哲学将真理和日常生活割裂开来的本质主义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并不是将真理简单地理解为效用、效能和实惠，而是说真理与人们的实践经验相关，亦即真理不是与人们毫不相干的、悬于众人头顶之上的、供人膜拜的对象，真理就是在人们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杜威在其1930年出版的《确定性的寻求》一书中将人类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作了透辟的分析，特别是动摇了本质主义认识论的根基——心灵物质二分的原则。杜威认为心灵不再是镜子，“不再是从外边静观世界和在自足观照的快乐中得到至上满足的旁观者。心灵是自然以内，成为自然本身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部分”。

实用主义学说的这一精粹启迪了日后的媒介认识论，当然这是一条相对隐秘的曲折的路径，经由帕克、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而来。

伊尼斯1952年完成的《传播的偏向》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著述。所谓“传播的偏向”其实就是文明发展的偏向，这一偏向是由具体的媒介和文化路径所致。偏向并不是指另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存在，而是说有什么样的媒介和文明演进的路径，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偏向。伊尼斯只是概括了口头文化偏向和书面文化偏向，它们代表了文明进程的两种不同路径。到了麦克卢汉，电子媒介的崛起使得问题一下子豁然开朗，身陷印刷文化之中的人们在困顿中早

有种种疑惑，一经麦克卢汉挑明——“媒介即信息”，立即大彻大悟，当然也一度掀起轩然大波。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难理解实用主义理论的要义，机敏而有穿透力的说法是将真理看作为一种“文化偏见”，显然其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述和媒介方式密切相连的。正如著名传播学家波兹曼循循善诱所指出的，“‘眼见为实’作为一条认识论的公理，从来都享有重要的地位，但‘话说为实’、‘阅读为实’、‘计算为实’、‘推理为实’和‘感觉为实’的重要性，随着文化中媒介的变化，也在跌宕起伏”。所以，“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①

如今媒介认识论的思想已经渗透到各种学说之中，不仅是传播学和媒介学，诸如民族学研究（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社会学研究（麦洛维茨的《消失的地域》）、历史学研究（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等，无不受其影响。当然，这些又多少可以追溯到实用主义哲学的源头。

宏观的看法要有微观的学理研究来做保证，王颖吉步步为营，由早期传播研究的心理学传统，到传播和交流困境的探讨，再到传播主体剖析，梳理出威廉·詹姆斯的思想余脉，这一影响研究做得极为精细。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国早期传播学研究兴起的宽阔的学术背景有所裨益，也能深化我们对詹姆斯·凯瑞等学者晚近倡导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这一思潮所包含的丰富内涵的认识。

蒋原伦

2010年1月25日于积水潭

^① 以上均参见波兹曼：《娱乐至死》，第二章，章艳、吴燕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的由来与研究现状	1
二、詹姆斯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与传播研究的主要关系	11
三、传播研究领域的复杂性及对詹姆斯“传播” 观念的理解	22
第一章 詹姆斯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心理学传统	40
第一节 冯特或詹姆斯：美国文化环境的一种选择和 心理学改造	40
一、美国传播研究的心理学传统及詹姆斯研究的 重要性	41
二、冯特、詹姆斯与美国心理学传统	46
第二节 威廉·詹姆斯与芝加哥学派及行为主义的关系	54
一、行为科学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关系	54
二、詹姆斯与芝加哥学派	58
三、詹姆斯与行为主义及行为科学的关系	67
第二章 传播或交流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83
第一节 交流传播的意识论理论基础	84
一、意识存在吗	85
二、意识的产生	89
三、意识流	93

第二节 人类交流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	97
一、思维与心灵的断裂或相接问题与传播研究的关系	97
二、思维间的裂缝是最绝对的裂缝：思维之间完美交流的 不可能性	100
三、两个心灵如何能知同一件事物：不同心灵之间交流的 可能性	106
第三章 詹姆斯与美国早期大众传播研究	118
第一节 詹姆斯与帕克的大众传播研究	119
一、帕克的教育背景与贡献	120
二、詹姆斯与帕克的社会学及大众传播研究	126
三、知识的两种类型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	137
第二节 詹姆斯与大众传播研究的心理学和认识论转向	144
一、李普曼与舆论研究中的心理学、认识论转向	146
二、詹姆斯的心理学、认识论与李普曼舆论研究的关系	151
第四章 “自我”与“自我”传播	161
第一节 詹姆斯的自我理论与传播研究的关系	163
第二节 “经验自我”与自我传播	167
一、经验自我及其构成	168
二、不同自我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177
第三节 “纯粹自我”与自我传播	184
一、纯粹自我的历史批判	184
二、纯粹自我与自我的传播	191
第五章 自我、社会与传播：詹姆斯、库利和米德	197
第一节 詹姆斯与库利的社会自我理论	197
一、社会中的自我意识过程	197
二、传播：人类社会生命的起源	203
三、社会自我与初级群体	206

第二节 米德：自我的社会形成与互动传播	214
一、实用主义者的理论综合与创新：米德的思想	
来源和体系	214
二、心灵、姿态与语言符号	223
三、米德对詹姆斯自我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比较的视角	233
结 论	245
参考文献	251

绪 论

一、问题的由来与研究现状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是美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与查尔斯·S.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和赫伯特·H.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并称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四大代表。正是在詹姆斯的努力下，发端于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原则得到了拓展和生活化，成为美国人文化生活中“活的”哲学，可以说詹姆斯是实用主义这一美国本土哲学的建立者。他在美国心理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是公认的美国现代心理学之父。他的《心理学原理》自1890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心理学者的推崇，是美国心理学领域最为成功、影响最大的经典著作之一。詹姆斯对现代美国学术界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杜威、米德、帕克、李普曼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以及安吉尔、华生等几乎所有的美国心理学家，都受到了詹姆斯思想的巨大影响，而这些接受其教益的学者又在整体上构成了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群体。因此，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界来说，詹姆斯无疑是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在哲学、心理学、宗教、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詹姆斯都是经常被提及的名字。

不过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实用主义思潮开始衰落，詹姆斯等实用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在一些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实用主义和芝加哥学派都是多少有些过时的、陌生的

名词。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美国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科学研究的深刻反省使人们再次将目光转向了实用主义哲学家,实用主义在科学技术和人文道德理想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的努力被视为纠正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过于偏重工具性和实利性弊病的良方。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为詹姆斯等人的“不确定性”、“多元的宇宙”观点的复兴提供了契机。在这种背景下,实用主义“在罗蒂、迪恩、威斯特以及大多数女性主义的研究里重新焕发生机(Dun, 1992; Joas, 1993; Seigfried, 1996; Dickstein, 1998)”^①。

近年来,实用主义复兴运动开始延伸到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一些传播研究者开始在实用主义思想家的思想遗产中寻找改造美国传播研究的方案。这使得当今的美国传播研究呈现出几种主要的发展趋向:一是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行为科学”的传播学研究范式,注重人的外部行为的量化实证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二是引入欧洲学术界的批判研究理论,致力于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发展反思性的批判传播研究。在这两种主要的倾向之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创新性的努力,其中一种尝试就是试图通过在整理发掘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的精神遗产基础上,对传统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范式进行改造。这种研究倾向与批判的传播研究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针对作为行为科学的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而出现的,两者在理论观点上经常是相互嫁接融合的,比如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的传播理论就是在融合了欧洲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美国实用主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传播文化研究理论的。哈特(Hanno Hardt)的研究也有类似之处,他将詹姆斯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传播研究视为与

^① [英] 布莱恩·特纳主编:《布莱克韦尔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238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欧洲批判传播研究相类似的传播研究范式。事实上，这种将欧洲批判研究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做法在欧洲思想家那里也同是一种探索创新的有效途径，哈贝马斯、阿佩尔以及艾柯等欧洲思想家都在自己的理论创新中引入了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米德等人的理论观点。

由于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逐渐形成的，因此，它的主要理论资源是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及量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对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影响尤其巨大，因此，在该领域的早期创立者施拉姆、贝雷尔森等人的论述中，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理论尚且不具有重要的意义，更别说皮尔士和詹姆斯了。不过，这一范式的后继研究者发现，忽略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因此他们在后来的研究中对此进行了弥补，施拉姆本人也在其晚年的研究中给予库利、帕克等实用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家以较为重要的地位。从总体上看，有关实用主义对传播研究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尚属于新兴研究领域。即便是在美国，这一研究的早期萌芽也只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而作为传播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则不过十余年时间而已，比较显著的专项研究成果大多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由于该研究领域主要属于传播哲学和传播学术史的范畴，因此，它更多地体现出学科的交叉性和跨越性，而不是专业性和独立性。也就是说，它的论域与欧洲批判传播研究或文化研究具有类似之处，是建立在广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的非学科或反学科意义上的研究。并且，由于实用主义具有批判反思的特点，这使得该研究领域带有美国式批判哲学的色彩。对于这一点，哈特在其 1992 年出版的著作《批判传播研究》中有很精详的论述，在“发现传播：实用主义与社会批判的追求”论题下，他对美国早期实用主义思想家

的传媒批判思想做了专题论述，他的基本观点是：美国早期传播研究是由实用主义思想家推动的，而这种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的道德批判倾向基础之上的传播研究是一种批判的传播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主流传播研究范式忽视了“批判研究的历史本质，没有认识到文化在媒介中的作用”^①，这种缺陷反映了实用主义在一个方面（个人价值与行为效果）对美国以后几十年的传播研究传统的影响。但与此同时，由于实用主义与欧洲理论的批判精神在学术渊源上有密切关系，因此，它也是克服和改造抽象经验主义传播研究的重要途径。

一般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传播研究领域中，杜威和米德是被最经常提及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他们的理论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美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典范。而查尔斯·S. 皮尔士和威廉·詹姆斯这两位更早的实用主义思想家，在美国传播研究领域中则显得默默无闻。不过，虽然皮尔士在美国传播研究中没有受到重视，但他在欧洲的符号学和传播研究领域中却声名显赫，被视为与索绪尔齐名的符号学创始人。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学术界对实用主义思想的“吸纳过程起初（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重点在查尔斯·山德斯·皮尔士和乔治·赫伯特·米德，而不是杜威和詹姆斯”^②。事实上，在四大实用主义哲学家中，詹姆斯可以说是传播研究学者关注最少的一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传媒历史专家都很少提到他，似乎这位在美国现代学术史上声名显赫的大师从来就没有关注过人类传播的问题，也没有在传播领

① Hardt, Hanno,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109.

②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见[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2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域中扮演过“对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解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①的角色。然而，考虑到与詹姆斯同处一个时代，并与他时有精神交流和学术师承关系的杜威、米德、库利、李普曼、帕克等人在传播研究中显而易见的成就，我们就应该对传播学术史上詹姆斯的缺席保持谨慎的态度。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詹姆斯在传播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詹姆斯的理论主要研究个体的精神、心理和道德问题，社会交往不是他关注的主要兴趣点。因此，尽管他提供了丰富的有关个人内在传播的心理学和哲学认识论观点，但对于美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传播研究的传统学者来说，这些理论的重要性并不突出，因为这些理论洞见与作为行为科学的大众传播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其次，詹姆斯的理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早期主要的社会科学家，并通过这些社会科学家影响了美国的早期传播研究，但这种重要的影响表现得并不直接，我们只能通过对那些受到他影响的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谱系和学术渊源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才能鉴别出詹姆斯思想的重要价值，这种曲折而隐晦的表现方式一定程度上使得詹姆斯的重要性被长期湮没。再次，受到詹姆斯影响的早期传播理论家（社会科学家）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分析哲学、实证主义社会学和行为科学兴起之后，詹姆斯思想的直接影响力已经减弱。因此，在20世纪40～60年代，美国行为科学的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走向“统一”并成功地实现经典化的时代，詹姆斯及实用主义都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他和传播领域的四大奠基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模糊，以至于不通过专门考察就很难发现。

①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p. 17. (本书中的译文主要以于滨、陈小平、谈锋等人翻译的《李普曼传》为参照。)

然而, 当时代进入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盛极一时的抽象经验主义社会学和行为科学受到了来自美国本土和欧洲思想的质疑和挑战。在不断的理论挑战和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中, 美国的社会科学(包括传播研究)研究主流范式^①遭遇了普遍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 新的研究范式如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传播的文化解释学、批判传播研究以及加拿大的传播技术学派等, 形形色色的研究范式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美国并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在这场跨越数十年时间、并最终确立多元传播研究范式的百家争鸣局面的运动中, 实用主义思想家们留下的遗产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理论支持。

形势的发展使得主流传播研究学者注意到了詹姆斯等实用主义思想家与传播研究的关系这一论域的存在, 只是他们没有对这种并不那么直接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关系做出过仔细的研究。早在 1980 年代, 美国最重要的主流传播研究范式的创建者威尔伯·施拉姆就已经注意到了詹姆斯与美国早期传播研究学者之间的关系。在遗留的有关传播研究史的研究文稿中, 他明确指出美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先驱者库利和帕克的传播研究都深受詹姆斯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 库利“在阅读威廉·詹姆斯的著作之后, 便决心采纳詹姆斯的方法(指获取真理是科学探究和证实的过程)去看待诸如传播效果这样的新课题, 而不是在主观思想中去预先猜想这些效果会是什么。他也能从詹姆斯的思想影响中脱胎出来进行自己独立的写作和思考”。至于帕克, 施拉姆说“他(帕克)受到同样影响了库利等一些思想家的影响, 威廉·詹姆斯就是其中的一位”^②。显然, 施拉姆对詹姆

① 在社会学领域主要指的是赖特·米尔斯所批判的“抽象经验主义”, 在心理学领域指的是行为主义。社会科学主流研究范式也就是所谓以实证和量化研究为手段、主要服务于行政、市场项目为特点的“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式。

② Wilbur Schramm; edited by Steven H. Chaffee, Everett M. Rogers,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p. 9~14.

斯加诸传播研究的影响已有所强调，但限于他研究述的主题是勾勒美国传播研究的主要线索，因此他没有对此展开论述。相比之下，罗杰斯（Everrett M. Rogers）在他的著作中对美国传播研究的论述并不限于勾勒主要线索，而是对美国传播研究的思想谱系进行一次有雄心的梳理。在著作中，他极大地拓展了施拉姆的论述范围。可惜对于詹姆斯影响的论述，他并不比施拉姆的论述更详细。很明显，他忽视了詹姆斯的影响。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随着美国传播界对于传播史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詹姆斯和皮尔士这样一度被严重忽视的思想家又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在哈特（Hanno Hardt, 1992）、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1997）等人的著作中，在凯特（Isaac E Catt, 1995）、勒奥赫斯（William J. Leonhirth, 2001）等人的专题论文中，詹姆斯又回到了传播研究史的讨论中，成为美国传播研究史上实用主义传统、心理学传统及心灵传播研究方面的重要人物。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有关詹姆斯与美国传播研究关系的研究还只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哈贝马斯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这些年来，‘实用主义’这个词在德国也已经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一个褒义词”^①。这种表述是对实用主义在美国复兴之后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对其重新关注的有代表性的表述。在中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与研究也逐渐成为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们所关注的热点，这一发生在哲学界的理论动向很快与胡适研究、陶行知研究等其他领域的实用主义研究热点相呼应，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实用主义研究的开展。2000年前后，国内再版和新翻译出版的实用

①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见 [美]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1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